

# 教育,须以价值观铸魂

异地高考、教育公平、学前教育……刚刚结束的两会,教育是一个热点议题。大家都关注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好事。今天,当教育投入进入“后4%时代”,教育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之外,如何提升育人质量也很值得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纷纷讨论如何涵养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这其中,中大大学校长张尧学委员的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建设一流大学,短板主要在价值观的判断和标准上。如果把大学作为一个挣钱的地方,一流大学是建不成的。”其实,不只是建设一流大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样离不开价值观的熔铸。

有一年,我到南方一所大学讲学,一位大二的学生抱怨:进大学第一堂课,竟然是“就业办”的老师给上的,讲的就是如何准备找工作。这个同学说,在中学被高考逼得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上了大学,马上又有就业的压力!学生的抱怨,值得深思。尽管大学生就业的确是重大问题,学校不能不管,但如果大学教育全都听命

于就业指挥棒,让实用实利的气氛笼罩校园,也就迷失了教育方向。

入学教育可能也把一些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可实际上办学的理念却是实用主义的,这就会影响学生的成长。总体上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显著,求实创新的氛围是主流。但也不可忽视,在一些院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庸俗现实主义确实存在。

比如,一些教授喜欢当“老板”,不愿上讲台,不想坐冷板凳。而一些学生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对学业、兴趣、理想等避而远之。在一些学校,问问同学们每晚的“卧谈会”都聊些什么,看看同学们课外读物都读些什么,就会知道,一股低俗、粗鄙的思潮正暗流涌动,不少自信满满的大学生其实很迷惘。这固然跟转型期的社会环境、思想困惑很有关系,但从教育自身反思,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

首先,思想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对接学生成长的实际情况、现实需求。不少学校在思想教育上不是不重视,也很下功夫,但为什么还是费力的压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想教育内容陈旧、思维僵化、方式生硬,不能针对现实问题回答学生的疑惑,

更难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这说明,思想教育再也不能走老本宣科、强制灌输的老路,需要充分考虑这一代学生的心理和接受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教育探索。

更重要的是,教育还需增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分量和内容,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人生观和世界观,决定人对人生意义和世界价值的基本看法,包括真善美、人与自然、人性与社会性、公平的准则、道德的底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源性的,牵涉到对人生社会的基本态度。对这些本源性问题的探讨与摸索,会引导价值观的确立,决定人生追求及思想行为模式。只有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正确认识个人与世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从思想深处拔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根子,重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从人的成长来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比知识获取更加重要。教育只有以核心价值观凝铸铸魂,才能真正立德树人,培养一批又一批身心健康、品质高尚的有用之才。

温儒敏

## 允许一次性筷子存在 就应做好监管

一次性筷子早已在我国的市场存在多年,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消费者在使用。一次性筷子的安全卫生程度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健康问题,但市场上至今都还缺乏对一次性筷子的生产、安全、卫生、使用等情况的监管。黄渤只是在偶尔的一次就餐中,将一次性筷子放入热水中涮了几下就发现了问题,然而每天都在负责食品卫生安全检查,拥有着人力、物力、技术等多方面支持的监管部门却未能察觉,不能不说叫人脸红。

一次性筷子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消费者看重了一次性筷子的卫生条件,害怕餐饮商家传统筷子卫生消毒不合格,造成细菌疾病传播,餐饮服务行业看重的一次性筷子的方便冲洗消毒的低成本效益。表面上看是双赢的,但是如果监管不到位,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

一次性筷子的包装多数都印有高温消毒清洁卫生的字样,但实际上,因为一次性筷子价格低廉,市场占有率大,为了争夺这块市场,很多小企业都采用硫磺熏,硫酸钠浸泡漂白,滑石粉抛光,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达到卫生消毒的目的,而一次性筷子的外包聚苯乙烯塑料给人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这种从生产线下来的东西,在高温下会产生更多的有害成分,会诱发人体产生很多的慢性疾病。同时也有专家向媒体表示过,一次性筷子也有保质期,一般来讲,保质期不应超过4个月,否则就会滋生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细菌。

由此可见,要想让消费者使用上安全卫生的一次性筷子就必须从生产到使用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但是从目前市场上的情况来看,监管显然是差强人意的。2005年国家质检总局就出台了关于一次性筷子的相关标准,要求“应有制造厂厂名、厂址……出厂日期、保质期和执行标准等标示”。但是现在市场上的一次性筷子仍然很少有生产日期,一些小饭馆为了节省成本,用的甚至是没有包装的裸筷。

近些年,关于是否继续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争论总是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就等于减少了对树木的砍伐,有利于环保,又有人说使用一次性筷子有利于拉动地方产业经济促进就业,同时比照传统筷子的清洁处理方式,还可以节约水资源。可是,关于一次性筷子到底是否应该退出市场,政府至今也未作出明确表态。

2010年6月,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7家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餐饮与饭店业开展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的通知》,要求餐饮与饭店业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但是那也只是基于减少的层面上,并未强制要求撤出。既然我们允许一次性筷子在市场上存在,那么就on应该予以监管。通过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用制度保护好消费者的健康。

如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挂牌成立,其负责百姓餐桌上所有食品从生产到食用的全过程监管,希望通过通过改革和职能改变,促进提高地方食品药品安全卫生的监管水平,保证百姓能够吃得踏实、吃得放心。不要再让百姓去香港买什么奶粉,更不要再上演“检验餐饮安全的标准是市长敢使用一次性筷子”的闹剧。

刁志超

## 定制酒,该寿终正寝了

政府机关定制酒并非此一例。仅这两天,网友顺着这条新闻,在微博上贴出了“河南检察专供酒”、“中国铁道定制酒”等图片爆料。有网友说,“四川监狱系统有点冤,其实在中国很多单位或者职能部门都有类似的定制酒,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为什么会有政府定制酒?苏虎彪称,“汶川大地震后,灾后重建工作日渐增多……伴随而来的对外接洽和考察都需要喝酒”。暂且不考虑大地震和监狱系统接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公务接待大量用酒在许多地方却是现实。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地方官员抱怨公务接待太频繁,一天要赴几个饭局。“喝酒也痛苦”是矫情,败坏作风、影响工作却是显见的威胁。

苏虎彪称,当时定制这样一批酒,“完全是为了降低成本……每瓶酒在100到200元之间”。这样的空口一说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不用说,这些定制酒的费用属于“三公消费”,最终来自纳税人。定制酒、专供酒已经成了特权的象征,让下级单位在领导面前有了面子,却耗掉了公民信任的“里子”。

目前并没有明文禁止政府机关向企业定制专供酒,由此催生了一条特殊的产业链。五粮液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做定制酒是要具备一些条件的”,“全国500强企业,还有100强的具有一些政府机关”才可以。

但说到问题的根子,谈什么公务非喝酒不可?政府机关又有什么必要去做定制酒?法无明文禁止并不是定制酒可以公然出现的理由,因为它本身已经是奢侈和特权的象征,更是与腐败相连。再去说什么“降低成本”、“不是给犯人喝的”,只能贻笑大方。

定制酒,该寿终正寝了。

萧道佐

## “八项规定”跑不过“公款旅游”



据《南方农村报》3月18日报道,今年1月份,广东省阳江市大约30名中小学校长到云南西双版纳、华东等地公款“考察”和旅游。阳江市有关部门表示,校长是按规定去“考察交流”的,活动费用由各校长回学校报销。一名参加活动的校长承认,“顺便了解了那边的风俗民情”,去西双版纳每人花费4000元。对于中央去年12月初出台的八项规定,阳江市教师校长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称:“文件到这边可能会慢一些。”

漫画/李宇

评点:组织公款旅游被揪出来之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悔意,相反却倒打一耙。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能怨人明知故犯,要怨也只能怨文件到得太慢?在如今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校长们难道就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不看电视?唯一接受上级指令的渠道是文件?只要看不到文件,就可以把中央规定视如无物,这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 铁路改革,以市场思路平衡效益公益

此番机构改革在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有关票价不会上涨,巨额负债问题也随之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

尽管原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铁路的平均票价是偏低的,火车票价今后要按照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但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要建立铁路公益性运输补贴机制。对公益性运输任务和公益性经营亏损给予适当补偿。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表示国家对铁道部贷款或债券等各项支持政策不变,商业银行对铁路总公司的贷款以及各类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债券不会因为铁道部改革而改变信用状况。

这意味着铁路原有的公益性原则

还将继续维持,国家对于铁路建设的支持仍一如既往。所谓市场化改革,企业化经营,并不一定立刻体现在价格上。事实上,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从1995年至今,尽管国民收入和运输成本已经翻了数倍,普通列车运价17年保持不变,网友晒出历年数张北京到武昌的硬卧车票,常年维持在280元。低票价政策,极大地降低了国人的出行成本,同时也吸引更多人选择铁路出行,在供给无法扩大的情况下,一票难求的局面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一成不变的低价也的确造成了巨额亏损,甚至使按市场定价的高铁面临诸多指责和压力。低价要亏损,涨价又面临指责。如何在市场化 and 公益性之间寻求平衡点,其实也是铁路改革需要探索的路径,这

对一个计划经营了60多年的部门来说,无疑是一个新课题。

因此,对于已经开启的铁路改革,我们不妨放宽眼界,公益性的原则当然坚持,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更须开拓。况且,市场化也并非一定涨价,电信系统一分为三,带来的是通讯资费的大幅降低。对公众来说,市场化改革的好处已为30多年发展经验证明,对铁路来说,市场化并不一定只意味着涨价,而是要用更加市场化的思路经营,如学习民航,根据需求上下浮动,建立包括折扣票、套票等更加灵活多样的销售运营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有效率的运营,也能够给公众带来更多便利,使政企分开的铁路机构改革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的平衡,成为利国利民的好举措。

君见

## 理性看待央视名嘴“扎堆出走”

近日,传闻李咏、白燕升和王凯三位观众熟悉的主持人走出央视这个大平台。对于主持人出走一事,央视并不愿回应和评价。(3月20日《华商晨报》)

到解决,当然就会跳槽,另谋高就。

其次,精英荟萃,难施拳脚。央视是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当一个人置身其中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的时候,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况且,电视媒体竞争失人才已是不争的事实,眼下,电视台呈现了一种群雄逐鹿的态势,有些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并不逊色于央视,与其

在央视熬年头,混日子,何不如到地方台大展身手?

从另一方面讲,电视台节目也好,主持人也好,如果长期单一化,就很容易造成公众的审美疲劳,节目求新,人员求变,这也符合电视媒体发展规律。

当然,一个为公众所熟知,并得到公众认可的节目主持人,一旦从荧屏上消失,多少会让人感到空落落的,但常言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央视名嘴“扎堆出走”契合了新时代电视媒体的发展要求,人们应该理性看待。

李红军

3月16日,江苏省血液中心主任孙俊称,该省血液紧张的局面在3月份都无法得到缓解。由于血液供应缺口大,南京一家大医院一天内停开了17台择期手术。据其介绍,江苏即将出台规定,单位如要申报文明单位,其无偿献血率须达到18%。(3月17日《现代快报》)

## 献血与评优挂钩 有损公益本色

说起供血紧张,以前一般只出现在春节、暑假等节假日,而这几年,供血紧张的情况,已不限于节假日。很明显,这种“常态化”的出现,与国人献血率不高紧密联系。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个国家为了维持足够的血液供给,需要1%~3%的人口参与献血。而据统计,我国2011年人口献血率只有0.9%。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也正是在此语境下,时常曝出一些医院因血液供应缺口大暂停部分手术。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缺少善心,也不缺少捐献的热情,最稀缺的是安全、高效的捐赠渠道和公开、透明的善款使用保证制度——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广大市民连夜排队献血就是最好明证。眼下,很多地方遭遇血荒,表面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公民献血率不够积极,但深层次原因则是社会信任缺乏。在“用血洗花”“无偿献血高价用血”“献血后感染疾病”等多个事件的相继曝出,伤害了公民的献血热情,这与郭美美事件之后各地红十字会受捐赠锐减,是一个道理。

正因如此,通过与评优挂钩绑架人们去献血,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要知道,早在前年北京市卫生局就规定,在推动团体献血量与地区精神文明考核挂钩工作的同时,无偿献血情况也将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然而,北京“血荒”并未因此得到根本缓解。原因很简单,《献血法》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如果将献血情况与单位评优考核挂钩(单位很可能通过一些手段强迫员工去献血),既违法,又违背了自愿原则。

笔者认为,无偿献血是一项慈善公益活动,而慈善的本质是公民的自发行为,非自愿的慈善,则背离慈善本意。将献血情况与文明单位评优挂钩,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血荒”,反而可能异化无偿献血这一爱心活动,它容易导致两种极端,一是部分人产生逆反心理,更加坚定不献血;二是有一部分人为评优,不顾个人身体状况,非自愿地参与献血——事实上,献血对象也有着特定群体,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献血,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参与献血,最终却因此而影响其评优,这显然也有悖公平。

从根子上解决“血荒”,关键是要保障献血用血的信息畅通透明。例如,献血和用血的各项成本以及所涉各个环节的全程透明,并尽量体现其公益性。唯有如此,才能打消公众顾虑,让公众放心地献爱心。此外,为鼓励广大公民积极献血也需要一些技术支持,例如针对街头献血,可以设立一些比较固定的献血屋,改善献血环境,不能让人们的献血热情因为天然、刮风下雨等天气因素而受到影响。

黄作财

日前,北京公布“城南行动”的下一步计划。未来3年,北京计划安排232项重大项目,总投资约3960亿元人民币,与百姓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重大项目数量和投资比重都超过七成。

## “城南行动”要善用“市场的手”

在北京生活的人,对于城市“南北差距”的问题,想必都不陌生。曾有南三环的市民感慨,自家周边环境与东三环、北三环相比,“感觉不像同一个城市”。的确,同在一个城市,如果就因为几条街道、几站路之隔,走的路、住的房、周边环境,就存在巨大差距,谁看在眼里,心里恐怕都不会觉得“幸福”。为了市民的幸福,为了城市的均衡发展,不能让城南继续落后下去。

过去3年,在第一阶段“城南行动”的推动下,南城的发展实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均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相比于其他发达区域、相比于市民的期待,城南“旧貌换新颜”的速度,还应再快一点。

或许也是为了加速改造步伐,“城南行动”的新计划相比老计划有了“升级”:老计划侧重“政府主导市场跟进”,新计划则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老计划更多起到“筑巢”作用,新计划则将目标锁定在“引凤”;老计划侧重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新计划将转向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造血功能的提升。

这几个变化,更准确地塑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让“市场主导”,政府才能将更多精力节省下来,关注民生,做好公共服务。在“南北差距”的诸多方面,公共服务无疑是需要弥补的短板。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市民的生活质量。我们注意到,在新的行动计划中,对南城确实有相当大的民生支出,比如,建48所城乡中小学、10家医院,确保各区各拥有1所400张床位以上的公益性养老机构,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性住房15万套等。

让“市场主导”,政府才能更好地回归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比如,在建设商业区的时候,不能忽视文物建筑的保护;在拆迁棚户区、平房区的时候,保护好居民合法权益。“城南行动”是一个大计划,但在执行中,不能忽视每一个“小市民”的感受和权益。

让“市场主导”,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中央在推进减少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北京对“南城计划”所涉项目,不妨也尽可能简化手续,给企业提供最大便利。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对政府职能错位的问题表态,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的确,政府不是“千手观音”,不可能包办所有事情,“城南行动”也是如此,“政府的手”只需管住、管好该管的,让更多“市场的手”发挥力量,南城的变化必然会更加快一些。

北方